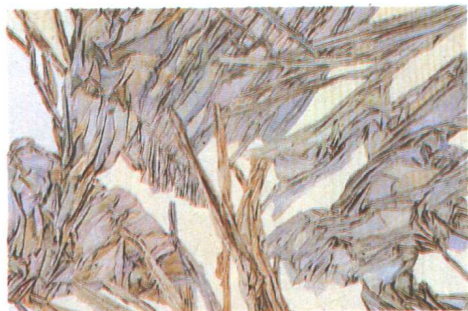


台湾当代 小说精选

· 1 9 4 5 — 1 9 9 0

郭 枫等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台湾当代 小说精选

1 9 4 5 — 1 9 9 0

郭 枫等编

I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献给 站在台湾土地上的人

站在亲爱的土地上

序《台湾当代文学精选》

郭 枫

许多正常的行为被批评为怪异，不正常的却被认为理所当然；许多永恒的事物被讥讽为落伍，暂时投机的被夸赞为超越时代；许多真诚的人被嘲弄为拙劣痴愚，虚伪巧诈的被加上辉煌的荣衔。这些颠倒错乱的景象，在历史上混乱的时代，固然也所在多有，但从无今日台湾出现之集中、之极端、之漫无边际！

这些颠倒错乱的景象，充斥在台湾社会的各行业和各角落，也具体地反映在台湾的文化层面和文学生态上。

台湾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四十年来，台湾在依附政治和依附经济的操作下，台湾文化也全面地成为依附美国和日本的文化，从许多文化界领导人物的意识和言行，到市井小民物质层面的流行趋向，都不折不扣地表现出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原貌。我们无须诧异台湾文化怎么落到如此地步？当各领域的统治阶层人物，大量地归化了美国或日本等外国籍，他们的家族和财富都转移到信誓效忠的异域，台湾整个环境如何被忽视？台湾文化是如何的文化？是可想而知了。

台湾的文学是怎样的文学？在整个文化成为依附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台湾这四十年来的文学，整体的情况也是美日的附庸文

学。在附庸文学的笼罩下，也有些不甘同流的人，总想要抗拒庸俗，坚守本土文学的理想，却宛如空谷足音，难以激荡成广大的回响。

四十年来的台湾文学，让人感慨的是，最容易的就是做一个作家，最艰难的也是做一个作家。

二

台湾最容易的就是做一个作家。

绝对掌握大众传播工具，绝对掌握文化出版机构，这是一切专制政权统治人民的共同手段。四十年来台湾为了遂行其彻底的依附政策。因此，台湾的文学，在大众传播媒体和文化出版机构的联合导引下，朝向非土地非人民的方向展开。台湾的作家，在教育和训练机关的培养下，调教出庞大的笔队伍，安置在各种官方与半官方的文化事业中，担任执行政策的文学干部。有些人辄专事撿拾西方文学的余唾，提拔雅痞流亚的文学青年，推广庸俗的轻薄文学。长期以来，台湾的作家之多，犹胜过江之鲫，其中条件特殊者，便运用庞大的传播媒体，大量宣传，密集曝光，以商业方式强力推广，制造可供使用的文学明星。

如此而来的作家族群，在思想水平上，大多数停留在原来所受的教育层次。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写作路线，纵有种种的分歧，也只是在形式的层面上有所差别；归根究底，都是要维护其集体的和个人的既得利益，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同样是传统贵族的后裔。所以，四十年来的台湾文坛，除了早期的反共文艺、战斗文学之外；有大力移植西方文学的流派；有专事闲适、情欲、梦幻……等等所谓轻文学的群落；有高谈破除国际，走向宇宙的狂想者；有遁入神的世界或禅的玄虚的空幻人物；等而下之，更有以搬弄名词和造作字句

为奇巧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充分显示出作家们缺乏理想，故乃符合台湾社会依附文化的需求，愈是脱离现实的东西，愈能掀起流行的狂热。

置身于如此文学氛围中，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独立作家，便异乎寻常的艰难了！他必须面对三种困境，第一是政治的困境：除了要继续承担统治当局的压力之外，近年随着政治上反对力量的兴起而形成文学上壁垒分明，让独立作家面临另一种干扰。第二是现实的困境：在台湾社会急速物化的形势下，一切事物的标准都建筑在钱上，所谓作家已逐渐与流行歌手同其格调，所谓作品已濒于可口可乐棒棒糖同其品味，一切趋向庸俗，独立作家面临了与整个社会对立的情况。第三是内心的困境：当纯正的作品遭到排斥，理想主义受人揶揄，面对着寂天寞地，独立的作家便须接受内心挣扎的严酷试炼。

一个有良心的独立作家，他必须排除外加的困扰，征服内心的彷徨，旷达而坚毅地，站在亲爱的土地上，举起他的笔来。

三

站在亲爱的土地上。

是的，一个有良心的独立作家，必然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作家，土地便是他创作的根源，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从土地滋生。

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包含不可或缺的素质：艺术、思想、感情。艺术是天赋和努力造成的。思想由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的认识。感情由何而来？由于对人民的关爱。历史和人民，都从土地滋生。

作家要能认识历史。从不同的历史资料中，正确地了解近代历史的真相，明白民族遭受的侵略与苦难，从中吸取教训和指引，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念。一个作家，如果缺少历史识见，对现实问题

不能探究其历史根源，他写作的东西，不是粉饰现实就是脱离现实，不是诅咒民族就是丑化民族，作品中看不到恢宏的气度和深厚的思想。只是美化自己，唱着不负责任的高调而已。

作家必要能爱人民。谁都知道，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每个作家都会说他的写作具备了爱，如果追问他爱什么？怎样爱？答案就有所不同，假设所爱的是一个政权、一个集团、一个人，为其私利而维护辩饰，这是自私和贪婪的行为，何有于爱？作家要能有民胞物与的心胸，悲悯人群的大爱；以博爱的情怀写作人间的悲欢，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焕发永恒的光彩。

有人说，作家是艺术家，只须创造艺术之美，不必对谁负责，不必有任何使命。不错，我们也认为作品如缺少艺术之美，根本不成其为文学；我们更主张作家不可成为政治的附庸，尤其在遭受那些领袖或导师的专制毒害之后，作家再也不能感染政治的狂热病；可是，我们认为，作家对社会和人群不能冷漠，作家吃的粮食用的器物都是大众生产的，岂能甩开大众？作家应该以炽烈的爱，拥抱着人群。

站在亲爱的土地上，以透视历史的智慧和关怀人群的大爱，写作反映时代的篇章。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为人间张扬正义；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为民族谱下史诗。

四

站在亲爱的土地上。

这也是我们刊印《台湾当代文学精选》的编辑方向。

特别把“台湾”冠在书名最前面，就是要彰显台湾，彰显台湾这

块亲爱的土地和广大勤劳耐苦的人民。我们不喜欢参与政治，不会为任何集团帮闲；我们只愿意为台湾的土地和人民工作。几十年来，坊间的大系和选集多矣，观其内容，有多少作家关爱台湾？有多少文章描述台湾？这是值得省思的问题。

《台湾当代文学精选》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关于台湾人、台湾事、台湾景物的作品。我们截取一九四五到一九九〇这四十几年作为一个断代，因为这四十几年是所谓“强人政治”的时代，现在，强人消逝，民主萌生，我们希望借这套选集得以略窥那个消逝时代的面貌。当然，仅凭这些作品来反映那令人惊骇迷惘的时代是不够的！因为当时严厉的高压和禁忌，使作家对作品题材必须多方规避，写作之际又要自我小心设限，以致更真实更深刻的东西不能写，创作的内容便浅化和窄化起来。此外，在这套选集中，也收录一些与我们文学理念不同的作家作品，我们愿意把这些作品公平地展示出来。

近半个世纪，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应该讴歌、应该愤慨、应该悲泣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创作的限制和时间的切近，迄未完整地写出来。也可以说，台湾文学的伟大作品，仍未产生。

我们期待，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有良心而独立的作家，能够以伟大的人格和爱心，举起笔，潜心创作出台湾不朽的作品。

我们期待，台湾所有的作家和作品，都能超越自我、关爱人群、勇敢而庄严地，站在亲爱的土地上。

《台湾当代小说精选》序

郑清文

台湾文学的路，可以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台湾有四百年的历史，这不算长，但是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却更短，只有六十多年的光景。

台湾的历史虽然不长，统治者却不断更换。

每一批统治者，至少在初期，都没有好好经营这一块土地的决心和诚意。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有的用高压的手段，有的用愚民的方法，来统治台湾。这时，不但谈不上什么文学，很长的时间，台湾的文化也一直在荒芜的状态中。

一般的看法，台湾文学开始于一九二〇年代。那时，最重要的本地作家是赖和。那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用尽各种方法来同化台湾人。最好的工具，就是语言。他们要台湾人学习日语。而当时，赖和用于写作的却是中文。这也是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特色之一。

由于教育的逐渐普及，使用日语的人越来越多，会用日文写作的人也逐渐增加。到了日据时代的末期，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陆续出现。此期，杰出的作家有杨逵、吕赫若、张文环和吴浊流等人。

台湾文学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学传统。

在清朝时期，读书是为了考举或附庸风雅。当时，台湾的读书人只是吟吟诗，死背几本古书。在中国大陆，古文和古诗有长久的

传统，在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西洋或日本比较，也是相当有限的。

当时，台湾的作家，读的是日文，由日文直接吸收日本文学，或间接接触英、法、德、俄为主的西洋文学。其实，日本的现代文学，也是嫁接西洋文学传统的。

这些文学，写作的技巧来自西洋，写作的内容却是本土的。也就是说，用更新、更有效的写作技巧，来展示本地的生活和感情。这是相当可贵的。

在日据时代的末期，由于战争，时局转紧，日本全国对于文学艺术做了全面的管制。当时，台湾的文学也是在管制之下，无法继续成长。

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那时，由于生活和文化的不同，由于统治者的偏颇和残忍的心态，导致了台湾历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随后，再由于当局为了保卫台湾而施行严厉控制。这使台湾立即沦落为文学的最黑暗时期。

因二二八及全面剿共，台湾整个社会已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没有人敢随便说话，遑论是文学的写作。实际上，那时候所谓的文学，也只有迎合政策的反共文学而已。

那时期，曾流传一种笑话，把遭受退稿的文章，再设法加点“反共抗俄”的口号进去，就可以刊登出来。然而只有观念，甚至只有口号，而没有血，没有肉的作品，怎么能打动读者的心？

在这时候，文学界出现了一位有胆识的编辑，便是联合报副刊的林海音女士。她了解什么是文学，她敢动用真正文学的稿。那时，台湾作家的文字还相当朴拙，但是感情却是真的，这是文学的最起码的条件。在当时要采用这种作品，是需要胆识过人的。林海音时代，的确培植了不少文学种子。不幸，后来林女士竟因采用

了一首叫《船长》的小诗，而引咎下台。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可悲的。

台湾文学之路，虽然布满荆棘，困难中却一直在成长。

台湾文学的困境，是在于整个社会缺少对文学的理解和推动的力量。

就当局方面而言，往往因为真正的文学具有批判性和叛逆性，经常站在相反的立场，而对文学有所忌讳，何况，他们在大陆吃过文学的亏。这是一个有限自由、不民主的社会，当局不但不鼓励文学，反而要想尽办法抑制其发展。

在外表上，他们并非没有鼓励文学。但是那种文学假的成分多，往往远离真正的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举一个例说，虽然设了很多文学奖，但是其得奖作品的素质，似乎还不如个人设立的吴浊流文学奖。

一般而言，日本和欧美各国都把现代文学编入教科书，尤其是日本和法国。试看那法国，他们的教科文几乎是文学的选集。反观我们这里，真正的文学作品经常是一种禁忌。

学界和评论界的畏缩、懒惰、疏忽和不诚实，也造成了文学的不振。文学不是简易的事。文学的写作和欣赏，都需要专业的修养。台湾的学界和评论家可说未能尽到把好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大众的责任。

日本人冈崎郁子女士到台湾来研究台湾文学，有一位教授告诉她，台湾没有文学。冈崎女士回日本，转向研究中国大陆文学，后来又重新肯定台湾文学，再转回来研究台湾文学，并和同好合作翻译《台湾现代小说选》五册（现在已出版三册）。

另外，据说大学教师的升等论文，研究对象必须是那些老古董，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算数。所谓学界大老，自己不读现代文学，不必说，还不鼓励年轻一点的学者去接触，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时代在进步,学界却如此固步自封。批评和创作,本来是相辅相成的,在台湾却是如此脱节。怪不得有人说,研究台湾文学,要去日本,要去美国。说不定,有一天,要去中国大陆了。

在台湾文学的蜕变过程中,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却形成台湾文学的转折点。

文学本来就是生活,没有土地哪里有文学。大家都了解,那次论战,政治的意义多于文学的内涵。

表面上,这是由论战发动,想肃清所谓文学的“杂音”和“杂质”。而实际上这正是当局的一种警觉和恫吓。

我们都知道,当局最怕两件事,一是通货膨胀,一是言论扩散。

当时的文坛,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一部分作家已感觉到,要推动真正的文学发展,必须争取更多的写作空间,为此,就必须先打破文学的禁制。那次论战的结果,不但没有抑制文学的发展,反而导致了本土文学的觉醒和蓬勃。从那以后各大报的征文得奖作品来看,便可以证实。这是发难者始料未及的。

这以后,由于时势的推进和作家的觉醒,以及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台湾文学的写作也慢慢走进了比较平坦的路。但是,真正能全不保留地写出自己的心声,却有待十年后当局宣布解严以后的事吧?

这四十多年来,台湾文学,虽然在极端困苦中成长,却依然留下了不少掷地有声的作品。

这部作品,号称《台湾当代文学精选》,所收录作品,是以台湾经验为主要考量标准;不分男女,不分出生和省籍,只要作品中所表达的生活或感情,是属于台湾的,便加以选入。

这套文学精选的小说部分,一共选六十几篇作品。我们回顾这些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过程,就可以了解他们为了建立这个文学世界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写作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

种牺牲。我们知道一些优秀的作家因写作而入狱。当然，为了某种理想而写的人，并不只这一些。

这套选集所收作家，出生最早的是吴浊流，一九〇〇年生，最小的是田雅各，一九六〇年生，相差六〇年，也可说相差有三代了。

由于时代的更替，最前面的二十年，作家有断层出现以外，以后的四十年，可说是紧密衔接。这也可以说明台湾文学，正走上一条更宽阔，更久远的路途上。

吴浊流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战前和战后，都用日文写作，再由文友译成中文。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注明写作经过和发表处所，这篇《幕后支配者》却未加说明。因为它写作期日较晚，有可能是他直接用中文写作，再经过朋友润饰或订正。吴氏的作品可说是他那时时代的社会的缩影，从他的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中一些特殊和异常的现象非常敏感，他更关心这些现象对社会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他的作品多有针对性社会弊病的意义。所以他在写作时，经常打听朋友安全尺度，写好之后，又造好两套拷贝，分别匿藏起来，等待发表的机会，战前如此，战后也如此。

在第一代的作家中，钟理和是少数直接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他一直在贫病交迫中，过着孤苦的生活。但是他依然不忘写作。他对于文学的热爱和敬重，来自他对于文学的正确认识。他的许多作品，多以身边事做题材。这可能和日本的文学传统有关，也可能是当时的写作环境使然。钟理和于一九六〇年逝世。当时，由于种种顾忌，以社会实况做题材的作品，还没有普遍被接受。而实际上，他自己的遭遇，就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他也以这方面的文学成就最为可观。

在许多台湾作家，陈千武是唯一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他是真正到过战地，面对过死亡的人。其实，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台湾人，何止万千，死伤的人数也实在不少。但是，留下来的记录，却少

之又少。日本，在战后出现过为数可观的战争文学。在台湾却寥寥无几。有人说，台湾人不属于爱好文学的族群，不擅于写作。这并不正确。这和文学传统有关，也和教育程度有关。陈千武的作品，可说是最宝贵的记录。

钟肇政在战后初期作家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他的作品以长篇为主，他的成就也是在长篇。他是第一群克服文字障碍，以中文写作的作家之一。那些人还包括陈火泉和文心等人。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向语文障碍挑战的过程。钟肇政的另一种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写作以外，还不断鼓励文友写作，介绍发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大家都在学习阶段，都还没有建立信心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

李乔是战后到目前为止的，最重要的本地作家之一。不管是质和量，他都有优异的表现。他的作品，有长篇、有短篇，都极出色。他也写评论，这方面他也有同等的成就。他对现实很关心，非常敏感，同时，他也是一位极富想像力的作家。他对于文学的热诚，也高人一等。他辞去教职，就是想专心写作。他的笔路很广，有时他写得冷若冰霜，有时他却热情奔放，他使用的技法，是多式多样的。在一个艰难的写作环境下，他有许多东西想表达，而又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所以，他就想办法加以变形。这反而使他的作品，更富艺术性。他是福克纳的最忠实信徒，一个题材，只有一个技法。他不断尝试，也不断有所突破。这是他的另一种成就。

施明正是灵魂的探索者。或许，如果给他一个更好的写作环境和写作训练，他有可能成为杜思朵也夫斯基那样的作家。他不但写作，也从事绘画。一般人是用头脑工作，而他却注入整个心灵。他是用生命来做墨汁的。他的作品，不断滴着泪和血。他是一个受过极大痛苦的人，人家在规避开痛苦，他却在承受痛苦。他是一个受难者。他有自己的信念，他终于死于自己的信念。

读白先勇的《台北人》，就曾令人想到乔艾斯的《都柏林人》。乔氏的都柏林人，是生于都柏林，长于都柏林，生根于都柏林，最后死于都柏林的人们。但是，白先勇所写的，却是来自大陆的一群没有根的人。那一群人，只能算是浮萍。由于战乱，他们来到台湾，却无法适存台湾。在白先勇的笔下，他们只是一群过客，他们永远怀着对于大陆的乡愁，有的甚至于完全在绝望中存活下去。白先勇出道很早。在他写作的时期，他的作品照理不会受当局的欢迎，或许是因为他有比较特殊的身世，才能顺利发表出来的吧。我们的读者应该为此庆幸。

陈映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谦称为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特色是无时不在关心社会，无时不想走在社会前面，领导社会，或影响社会。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权势和财物远比知识重要，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没有重量，知识分子不要被视为异议分子已万幸，他们的言论自然也不受重视。所以陈映真的初期作品，都有浓厚的个人的感伤主义色彩。后来，他的言论渐受重视，他的作品也更完整、平衡和更有信心，对于社会的关心也更为广泛。他的作品，以精确的文章和清楚的意念见长，是这一代最优异作家之一。

七等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作家。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艺术家。有人说他不关心社会。也许，他关心社会的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也许，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东西。他对意象的捕捉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他使用文字的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紧密而浓烈的。读他的文章，时常有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们的文坛有这样一位作家，也是可以显示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本质上，黄春明是一位富于叛逆性的作家，这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如《无头的蝴蝶》《把瓶子升上去》看出端倪。由于他有过人的胆识，往往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也敢于写出别人所不敢写的，所以他往往拥有比别人更宽阔的创作空间。黄春明的作品，一

部分含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另外一部分，则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不管哪一边，他都有优异的表现。有一次，几位文友曾经去拜访过他，要他多写乡土性的作品，因为只有黄春明可以写出那样的作品，至于有批判性的作品，可以留给别人。黄春明同意了，我们也正在期待他写更多这方面的作品。

王桢和和杨青矗，可说是比较早使用台语写作的作家。王桢和的尝试，使我们想到了写《神曲》的但丁。但丁一直主张用母语写作。因为他的才华，方言反而取代了当时的正统文字拉丁文。不过，王桢和的台语，并不是民众所使用的方言，而是依他自己的见解独创出来的。这种语言本身，已构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成为王桢和的语言。由于著作权的考虑，王桢和未能同意他的作品收录本集，是很可惜的事。

杨青矗的台语，是纯粹的台语。杨氏对于台语的研究，是有专精的。杨青矗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他是一位工人作家。他写工人，展示工人的生活，也提出工人的问题，更想进而为工人谋福利。为了写小说，他还亲自去了解工人生活的细节，所以他的作品都具有真实感，不流于抽象或观念化。他认为文学的力量有限，所以参选立法委员，要直接为工人说话，替工人解决问题，却不幸卷入“美丽岛事件”被捕入狱。除了杨青矗以外，属于工人作家的，尚有陌上尘。

从名气而言，钟理和远比钟铁民大。有不少人知悉钟铁民，很可能是因为他是钟理和的儿子。这是很不公平的。钟铁民本身就是一位优越的作家。当初，钟理和因为写作事业的艰难，临终时禁止钟铁民步他后尘。这应该是很悲痛的决定，有如卡夫卡临死前要求他朋友烧掉他全部遗稿的心情一般。但是，竹筴总是要出土的，钟铁民还是写了。他写得不多，却篇篇精彩。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一连三代都遭受到重病的折磨，在一般人无法忍受的逆境中，他的许多作品都呈现着愉悦和风趣，令人想到了音乐神童莫札

特的遭遇和艺术。这也是非常可喜的。

林双不写得快且多，他的笔力和精力都是惊人的。他对社会的关怀，相当强烈。他是一位教师，他为学校和教育界所写的系列作品，严厉地针砭了教育的时弊。教育是社会的基本。但是，由于政治的介入，台湾教育界存在着许多畸异现象。教育有大弊病就无法造就一个健全的社会。林双不用一支锐利的笔，把教育界的症结一一挑了出来，直接指摘政治干预教育，政治毒素已侵入校园。做为一个教师，这是很危险的。有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要坐牢。但是，他似乎一点也不畏缩，因此他的作品气势磅礴，像一条大河一般。

宋泽莱是一位可怕的作家。他可以写小说，可以写诗，可以写文艺评论，也可以写政论。另外他还谈佛论禅。从小说而言，似乎没有什么题材可以囿限他。他写农人、工人，也写政治家和军人。毛姆说过，只要他和一个人谈论一小时，他就可以那个人做题材，写一篇小说。宋泽莱似乎也有这种本领。

在这部大系入选的小说家中，有五位已经过世。吴浊流、钟理和是属于上一代，施明正于去年过世，活了五十多岁，属于中间的一代。在年轻的一辈中，洪醒夫和钟延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而且都是因为车祸而逝于非命。这是非常可惜，也是可哀的。洪醒夫和钟延豪最大的不同是，一个重技巧，一个重题材。洪醒夫所写的，大部分是乡村里的农民，他的文章细腻而活泼。钟延豪的作品，题材较广阔，笔触也粗犷而强烈。

在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张大春是才气很高的一位。他的作品，结构紧凑而完整，文字准确而生动；手法新颖，内容也相当丰富。他长大于眷村。在目前这个冷漠的社会，即使住在隔壁，也往往老死不相往来的。眷村，有时是一个结合体。那里有各形各色的人物，人际关系紧密而复杂；对张大春正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